

# 董仲舒问答法解《春秋》探析

张俊娅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兰州 730030)

**摘要:**继孔子之后,西汉董仲舒在下帷讲学期间完美阐释了启发式教学法。孔子在书写《春秋》之时有避讳与畏惧、褒贬与善恶、合道与非礼、常变与亲疏等现实处境与情感向背因素,使得《春秋》的书法与辞法有常变之别、事实与描述有抵牾之处。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问答体解经即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而设问,而以史实、《春秋》辞法、《春秋》大义作答,通过对一件事的分析而上升到对一类事的总结,最后完成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而揭示《春秋》义理,才是董仲舒问答体解经的最终目的。董仲舒的问答式教学法对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深入挖掘与理解文字背后的圣人之言与《春秋》之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设问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4-0008-06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sup>[1]95</sup>这是中国先贤孔子于2500年前提出的启发式教育理念。相传孔子有弟子3000人、贤者72人,启发式教学法应该是孔子教学实践的产物,但是孔子在教学中是如何应用这一教学理念的,史书无传。

《春秋》是孔子据鲁国国史而作,《春秋公羊传》是最早的著于书帛的《春秋》之传,西汉大儒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博士,《汉书·董仲舒传》言董仲舒“下帷讲学,三年不窥园”<sup>[2]2496</sup>,其所讲者,必包括《春秋》在内的圣人之言以及《春秋》大义。王充《论衡·超奇》说:“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sup>[3]614</sup>此语未必全信,然而后世学子自董仲舒近习《春秋》,远识孔子应是重要途径则无疑。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以问答式教学法完美地诠释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理念。邓红说董仲舒在《公羊传》的基础上解经,阐发《春秋》笔法及《春秋》大义,正是董仲舒下帷讲学期间对学生讲解《春秋》的过程<sup>[4]22</sup>。季桂起则深入《繁露》文本,认为《繁露·楚庄王》包含了董仲舒解读《春秋》的理论依据、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是窥见董氏春秋之学的必入门径<sup>[5]</sup>。

目前对于董仲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阐发其政治哲学,对其揭示《春秋》书法、辞法与探求《春

秋》之义与圣人之思的贡献以及下帷讲学期间的教学方法较少关注。有感于此,笔者以《春秋繁露》(后文简称为《繁露》)中的问难为导向,借助《公羊传》的阐释,爬梳、归纳董仲舒问答体解经的方法与过程,为先辈做星火传薪之举,以就教于方家。

《公羊传》全篇以问答体解经,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即以5问5答解释《春秋》一句“春,王正月”<sup>[6]1</sup>,《繁露》第一章即以问答体解经,可视对《公羊传》问答式解经的传承,也体现出董仲舒对孔子、对《春秋》的承袭。《繁露》的前五章,要么针对经传之不同而发问,要么对比常辞变辞而诘难,以“难者曰”“问者曰”设问而自答,层层深入解经。《繁露》之问有以下句式:以“难/问者曰”“春秋曰”起首,以“……何也?”“……何……也?”“何以……?”“奈何……也?”“……何如?”“何……?”“奚……也?”“奚由哉?”“奚恶乎/于……也?”构成问答句式,回答的内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史实,二是关于《春秋》大义或者《春秋》书法,三是举一反三,由解答一件事而上升到总结该类事,并且完成对于孔子褒贬损抑、对于《春秋》义理、价值取向的揭示。邓红亦举例说明董仲舒是通过“问”“解”“一般原则”“结论”四个部分来解经<sup>[4]22</sup>,证明其也是看到

收稿日期:2021-04-17

作者简介:张俊娅(1977—),女,陕西咸阳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博士研究生。

了董仲舒问答式解经方法在《春秋繁露》中的体现。

《春秋》的书法及辞法有一定的范式,这叫《春秋》常辞。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春秋》违反了通常的书法与辞法形式,这其中往往包含着孔子欲言又不敢言或者不尽言之处,因为孔子在书写《春秋》之时,有避讳与畏惧、褒贬与善恶、合道与非礼、常变与亲疏之别。这些状况的存在使得《春秋》的书法与辞法有常变之别,事实和描述有相互抵牾之处,董仲舒问答体解经即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启发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然后进行分析与讲解。董仲舒的问答体解经,涉及《春秋》的辞法问题、礼制问题、笔法问题、《春秋》大义问题等各方面,拙文也以问题为导向,仅从以下三个问题来分析董仲舒问答体解经的方法与特点。

### 大一统问题

大一统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基本观点,最早见于《公羊传》。《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曰:“春,王正月。”<sup>[6]1</sup>《公羊传》曰:“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sup>[6]1</sup>后世言及的《春秋》大一统问题即肇始于此。大一统问题的指向是要求各诸侯国统一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主要表现为各诸侯国处理外政应该接受周天子的指挥,不能擅自作主。孔子持大一统的观点,主张各诸侯国接受周天子的领导。《春秋繁露》首章《楚庄王》首句,董仲舒首问即是针对大一统问题。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sup>[7]2</sup>

《春秋》常辞,连国称爵,如称齐桓公、晋文公、鲁隐公等。楚庄王是贤君,《春秋》对于楚庄王整体上持正面态度,但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春秋》经曰:“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sup>[6]360</sup>《公羊传》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专讨也。”<sup>[6]360</sup>专讨,是为擅讨。夏征舒是陈国大夫,于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弑其君,楚庄王杀夏征舒,是为陈国讨贼,按说应该予以褒奖,按照《春秋》常辞应称其为楚子,但《春秋》书“楚人”,是贬称。书“楚人”的原因如《公羊传》中所说的“诸侯之义,不得专讨”<sup>[6]360</sup>。

齐国庆封与崔杼谋杀齐庄公,祸乱齐国,齐景

公三年(公元前546年),庆封率领族人奔鲁,后又奔吴。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会同他国之君共伐吴国,执齐庆封。同为讨罚有罪之人,同样是楚王,一个被称“楚人”,一个被称“楚子”,形成鲜明对比,前问即是董仲舒针对《春秋》用辞不同而设问。接下来,他回答:

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贬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sup>[7]2</sup>

董仲舒回答夏征舒是有罪之人,楚庄王是贤君,属于陈述事态。但是以贤君讨罪重之人仍然有其应贬之处,即是《春秋》书法原因:“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嫌得,就是嫌于得理,嫌于得褒,使人误以为做得正确、做得有理。夏征舒是有罪之人,楚庄王讨罚他貌似得理,但也有不得理之处。廖平分析《春秋》称楚庄王为楚人,称楚灵王为楚子时说:“楚庄讨夏征舒,此嫌于美得讨,故贬称‘楚人’,言‘入陈’,因其嫌美,故以恶辞异之也。楚灵讨庆封,称‘楚子’,不言入,楚灵恶不嫌于美,故不异辞也。”<sup>[8]2153</sup>正是董仲舒说的“《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之意。赵伯雄说:“因为庄王比灵王要贤,他所做的事(杀夏征舒)更貌似正义,所以要特别指出其行为的错误之处(专讨)。……‘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专拣那些公认的‘贤君’来贬,这就叫做‘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sup>[9]150</sup>。

从庄王杀陈夏征舒一事,董仲舒提出《春秋》中这一类事: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正常文法是“不予齐桓专地而封,不予晋文致王而朝,弗予楚庄专杀而讨”,这三件事的共同特点是“专”,即是“擅”。杞国灭亡了,齐桓公为杞国筑城,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公羊传》曰:“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sup>[6]188</sup>晋文公之事见于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的践土之会上,晋文公以诸侯身份召致周天子来参与盟会,楚庄王讨罚陈国夏征舒。此三人三事都有同样的性质,表现为不尊重周天子的天下领主身份,处理外政全由己出。这便是董仲

舒回复楚庄王被称楚人、楚灵王被称楚子的《春秋》大义原因,揭示了《春秋》义理中的大一统的观点:《春秋》尊天子,诸侯擅自讨伐,即使是讨伐有罪之人,《春秋》也予以贬斥,因为讨罚令应该自天子出,只有周天子才能下令讨罚他国。季桂起说:“《春秋》对楚庄王、楚灵王,称‘楚人’也好,称‘楚子’也好,都带有贬责的意思。其原因在于他们的行为都没有得到周王室的授权,属于自己的专断之举,即董仲舒所谓的‘专讨’,这是严重违背周礼的。”<sup>[5]</sup>这与本文所见略同。

董仲舒不仅举一反三,而且上升到贬斥所有的诸侯不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行为。他说:“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贬矣。”诸侯中凡未得到周天子的授权而擅自讨罚的,《春秋》均持批评态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均为贤君,以贤君之行尚有不得义之处,则其他诸侯之行为,便可以知之。因此董仲舒说“《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况,即为比。学《春秋》者通过一个事例即可知《春秋》对这一类事之褒贬,此后这一类事《春秋》不再赘述,这就叫“文约而法明”。董仲舒的问答体教学法在大一统问题中就完成了事实、《春秋》书法与《春秋》大义的统一。

### 赵盾弑君问题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sup>[10]3297</sup>董仲舒谓之“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sup>[7]40</sup>。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臣子不再履行臣子之道,因而《春秋》及《公羊传》多有记载为臣之道。上述的大一统问题是要求各诸侯国履行臣子之道尊奉周天子,鲁桓公时期的郑国祭仲保君存国被认为是践行了为臣之道,鲁庄公时期的鲁公子季友有杀兄之嫌而《春秋》及《公羊传》以其为贤,就是因为他“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sup>[6]176</sup>。赵盾是晋国重臣也是忠臣,但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春秋》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sup>[6]336</sup>。这是春秋史上的一段著名冤案,通过董仲舒以问答法解经的方式,才使我们得以窥见《春秋》设此冤案的背后赵盾所肩负的臣子之道。

赵盾弑君事见《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身为国君,却多次不行君道,赵盾多次劝阻,引起晋灵公厌恶,晋灵公谋杀赵盾未果,赵盾逃亡,赵氏家族赵穿者,弑灵公。弑晋侯者,实赵穿而非赵盾,太史董狐嫌赵盾身为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

讨贼”<sup>[11]724</sup>,书“赵盾弑其君”于史册<sup>[11]711</sup>。《春秋》之常辞,贼不复见,是说弑君之贼不会再次被写入《春秋》。董仲舒说:“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sup>[7]36</sup>是说讨罚了杀君之贼,《春秋》就会书写君王下葬,若没有处罚贼人,则《春秋》不写君王下葬,而杀君之贼也不会再次被写入《春秋》,以表明臣子没有尽到讨贼的职责,贼人也应该被处罚而死。但是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春秋》经曰:“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sup>[11]750</sup>《春秋》破贼不复见的书法。董仲舒就此发问:

今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牒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弑君,何以复见?”<sup>[7]37</sup>

对于许止之罪与赵盾之罪,董仲舒常将之相提并论。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sup>[6]544</sup>。因为许止未能为其父尝药,而其父饮药之后身亡,《春秋》书许止弑父。该年又有“冬,葬许悼公”<sup>[6]544</sup>,许止之事也破了《春秋》贼未讨不书葬之书法。董仲舒将赵盾与许止之事放在一起回答上述之问:

训其终始无弑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sup>[7]39</sup>

董仲舒首先说明“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牒复见”的事实原因:一是赵盾始终没有弑君之心。二是赵盾在逃亡时听到赵穿弑晋灵公的消息,他的过错是未能逃离晋国国境(不遂去)而返回,因而仍与晋灵公有君臣之义,如果逃离晋国国境则与晋灵公不再有君臣之义。因而孔子叹曰:“惜也,越境乃免。”<sup>[11]725</sup>三是赵盾返回之后未能讨杀赵穿,没有履行为晋灵公杀贼的臣子之义。《春秋》再次书写赵盾,就是为了澄清赵盾未亲弑灵公,同时也就说明了“复见”的书法原因。孔广森云:“亲弑君者赵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为穿之罪易见,而盾之咎难知也。所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者也。然而与使复见,则与亲弑者有间已。……《春秋》之意,方将因盾复见,起不亲弑之迹,则穿之恶未得揜尔。盾以文诛,穿以实诛。”<sup>[12]165</sup>

董仲舒回答:“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

之节。”<sup>[7]39</sup>是说《春秋》借赵盾之事，阐明《春秋》之义中臣应该为君讨贼的道理。关于赵盾背负的臣子之道这个问题，董仲舒认为应该进行深入探讨，因而有二问曰：

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sup>[7]41</sup>

是说晋灵公被弑，而其他王公大臣重卿权臣在而不讨贼，《春秋》仅斥责其不是臣子，赵盾不在而被冠以弑君之罪名。在的人罪恶更深重，赵盾不在因而相对来说过错较轻，为何对于在的人要求低，对于赵盾要求如此高呢？董仲舒的回答紧紧围绕臣子之道这个问题。

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sup>[7]41</sup>

赵盾是贤臣，而即使是贤臣，也会有过错。人们只看到他的贤却意识不到他的错，也因为他的贤名，人们对他的关注度更高，因而《春秋》在他身上赋予更多的责任。《春秋》对于赵盾的高起点严要求，是因为《春秋》在赵盾身上赋予了臣子之责，是因为《春秋》担心人们不知道对错与否，而以赵盾为镜，使人自己省悟自己的对错而明白君臣之义。苏舆说：“《春秋》责下轻而责上重，责小人恕而责君子愈严。众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春秋》不欲责求，对于赵盾大贤，重累责之。”<sup>[7]42</sup>赵盾思想大于形象，就是因为他承担着《春秋》的价值标准而有着榜样的意味。如此在赵盾弑君问题上，董仲舒之问答法解经，就完成了对《春秋》义理的升华。

### 敬贤重民问题

先秦时期，中国与夷狄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文化上的概念。唐代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sup>[13]</sup>是说夷狄接受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进入了边远地区，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也就成为了夷狄。晋是周朝的

后代，自然是中国人；而楚国因为没有受到太多周朝礼法的约束，因而中原地区民众就把楚国视为夷狄之国。楚国的这种形象在楚庄王时期得到改变，邲之战是主要节点。

晋楚邲之战发生于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春秋》经曰：“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sup>[6]362</sup>《公羊传》曰：“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sup>[6]362</sup>即《春秋》常辞大夫不敌君，是说卿大夫不与国君做对手。《春秋》常辞以中国为礼仪之邦，楚为夷狄之国，中国之称，连国带爵，然而邲之战中，《春秋》直称楚庄王为楚子，而单言晋，视之为夷狄。董仲舒此处的设问即是针对《春秋》的常辞与变辞而展开。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邲，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sup>[7]44</sup>

邲之战中对于晋楚的称呼为何“偏然反之”，董仲舒在回答中一是指出晋被冠以夷狄之称而楚被呼为中原之国的《春秋》书法原因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sup>[7]45</sup>。《春秋》无通辞，是说《春秋》没有一成不变的通用辞法，通辞与常辞之间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可以划等号。《春秋》常辞“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因为“《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sup>[6]417</sup>。但是对于邲之战，这种常辞被打破。楚庄王伐郑得胜而不有其地，舍郑而去，但是晋国救郑而挑战楚国。因为楚庄王的行为合乎中原之礼，因而称其为“楚子”，而晋国的行为却似未经教化的夷狄之人，因而单言“晋”，《公羊传》曰：“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楚庄王的表现知礼，晋国此举不知礼，既然“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春秋》此时以礼为价值判断标准，批评晋军不合礼的行为，故《春秋》书法“移其辞以从其事”，称楚为君子而晋为夷狄。

董仲舒的回答二指出事实原因为“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邲之战中,楚庄王伐郑胜而不有其地是春秋历史上的一段美谈:楚庄王伐郑得胜,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接楚庄王,楚庄王看到郑伯能够依礼下人,一定在民众中有信用,因而舍郑而去。而晋国人不理睬会庄王的好意,前来挑战楚军。

董仲舒的回答三指出《春秋》大义原因:“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晋国看不到楚庄王贤人善心,轻视民众性命,而要挑起战争,这种行为是《春秋》所贬斥的。孔子赋予《春秋》王者之心,其目的是为万民谋幸福,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春秋》大义。董仲舒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sup>[7]46</sup>《春秋》对于使民众受苦的行为都是贬斥的,何况对于晋国主动挑起战争而伤民害命的行为呢?

最后,董仲舒从邲之战伤贤害民出发,批评这一类历史事件,揭示《春秋》批评晋国行为的根本原因是《春秋》敬贤爱民:“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想趁着晋文公丧葬期间进攻晋国,蹇叔谏曰:“千里而袭人者,未有不亡者也。”<sup>[7]125</sup>蹇叔劝穆公不要劳师袭远,秦穆公不听劝告,“师果大败殽中,匹马只轮无反省”<sup>[7]125</sup>。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sup>[11]293</sup>郑文公厌恶高克,派高克将兵于外驻扎,再不召回他,于是兵众溃散。董仲舒由批评晋国轻视民众性命而挑战楚国,到秦穆公不听蹇叔劝告而致崤之战,再及郑文公因厌恶一人而弃师,这些事件的共同性质就是伤害民众。《春秋》对邲之战中晋国的批判也是对所有使得生灵涂炭的武功侵伐的批判,董仲舒对于《春秋》邲之战变辞的诠释至此也完成了由比到类的总结。

## 结语

由上述分析来看,董仲舒的问答法解经,以存在于《春秋》中的书法与辞法矛盾之处为切入点,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深入学习《春秋》。董仲舒的解答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原

因;二是《春秋》书法或者《春秋》大义原因;三是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由一件事上升为一类事。最后,董仲舒对《春秋》问题的阐释,往往完成了从《春秋》之事到《春秋》之义的升华。季桂起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从讨论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楚灵王杀庆封二事入手,认为《繁露·楚庄王》篇主要讨论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对《春秋》记史的修辞方式及其思想依据的探讨;二是对《春秋》记史的叙述结构、叙述特点及其思想理论的探讨;三是对《春秋》记史的思想主旨及历史价值的探讨<sup>[5]</sup>。季氏之说,是看到了董仲舒对于《春秋》的书法形式、《春秋》的思想和历史意义。

与董仲舒解《春秋》由分析《春秋》常辞、异辞入手而归于《春秋》义理相似,应该注意到,《春秋》是讲义理之书,摆事实是为了讲道理,事实不是焦点,道理才是根本。在大一统问题中,董仲舒由批评楚庄王杀陈夏征舒,到批评齐桓公擅封土地、晋文公私召周天子,是想让各诸侯国明白应该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道理。在赵盾弑君问题中,董仲舒由赵盾未有弑君之实而被冠以弑君之名,这种对赵盾近似苛刻的要求,是因为赵盾承担着《春秋》的价值期待而有着榜样的意味。在敬贤重民问题上,董仲舒由批评晋国挑战楚国,到批评秦穆公掀起的崤之战,再到郑文公轻众丧师,揭示的是《春秋》爱民之心,以及对所有战攻侵伐、伤残害命行为的唾弃。因此,在董仲舒的解经中,事实只是一个楔子,讲道理才是根本,借历史事实来讲义理才是孔子、《春秋》与董仲舒的目的所在。

《春秋》本就是讲义理之书,其间寄予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社会期待,否则春秋240年间天下诸事,何以能以一万八千字得以表述?《繁露》之外,董仲舒也表达了这种看法。司马迁曾从学于董仲舒,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总体观点,他曾听闻董仲舒说过:“《春秋》者,礼义之大宗。”<sup>[10]3298</sup>“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sup>[10]3298</sup>也就是说,孔子将自己的王道之心蕴于《春秋》的纪事之中,由事见义,才是圣人著《春秋》的最终目的,理解《春秋》的义理,才是理解《春秋》的根本。这也是董仲舒问答法解《春秋》的最终归宿。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

天”<sup>[7]</sup><sup>91</sup>正是此意。苏舆说：“论春秋者，泥词以求而比，多有不可贯者，故一以义为主。”<sup>[11]</sup><sup>44</sup>即是在《春秋》之辞表达上有所抵牾的情况下，理解《春秋》的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就是“义”。知此，就会理解孟子所说的“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sup>[1]</sup><sup>300</sup>和庄子所说的“《春秋》经世先王之志”<sup>[14]</sup><sup>47</sup>。这些对《春秋》的定义在意义的取向上是一致的：孔子赋予《春秋》王者之心，《春秋》就是讲义理之书，而这些义理就是为天下谋太平、为万民谋幸福。

董仲舒于下帷之中教授弟子时，由问答体的引入，到对《春秋》事实的说明，再及对《春秋》书法、《春秋》大义的揭示，完成从表象到本质的升华。应该说，董仲舒的问答式教学法对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深入挖掘与理解文字背后的圣人之言与《春秋》之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后世学者深入学习《春秋》指明了途径。

###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 邓红.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5] 季桂起. 论《楚庄王第一》在《春秋繁露》中的地位及作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2).  
[6] 刘尚慈. 春秋公羊传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7]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8] 廖平. 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M]//廖平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9] 赵伯雄. 春秋学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12] 孔广森.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3] 韩愈. 原道[M]//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魏仲举, 辑注.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版), 2006.  
[14] 郭象, 成玄英.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Exploration of Dong Zhongshu's Question-answer Method of Interpret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ZHANG Jun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Confucius, Dong Zhongshu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erfectly explained the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 while giving lectures. When Confucius wrote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re were factors of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and opposition, such as avoidance and fear, praise or blame, good and evil, harmony and impropriety, constant change and degree of intimacy, which made the method of writing and rhetoric of the work have constant changes, the facts contradict the description. In *Chunqiu Fanlu*, Dong Zhongshu's question-answer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started from asking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and then answered them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rhetoric and principles of right and wrong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ummarizing the same category by the analysis of one thing and finally finishing the elucidation of work's argumentation, which was the ultimate goal of Dong Zhongshu's question-answer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Dong Zhongshu's question-answer teaching method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nspiring students to discover problems, to dig deeper into and understand the words of Confuciu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Chunqiu Fanlu*;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eaching method of using rhetorical questions

(责任编辑 雪 箫)